

["一带一路"研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跨文化合作研究

洪 军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中东研究所,上海 200083)

摘 要:文章根据对罗伯特·基欧汉的国际合作理论中“合作”和“国际机制”两部分理论,结合当下时政对国际合作理论范式适用于“一带一路”跨文化合作展开诠释,并就国际合作中所遇到的问题与障碍提出几点对策建议。一是增强政治互信,加强政策对接,是“一带一路”倡议得以实现的首要前提;二是互惠互利、合作共赢,有助于消除偏见、打破壁垒、促进融通,借助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公共平台让中国企业和产品成功“走出去”,实现“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共赢新模式;三是加强“民心相通”工程在文明对话与包容互鉴中所起核心要素的作用,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的友好交往、相互尊重和理解打下坚实的社会和民意基础。

关键词:跨文化合作;国际机制;“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对策

10.16023/j.cnki.cn64-1016/c.2019.04.014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586(2019)04-0077-05

一、引 言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以美国为首的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疲软和衰退,直接导致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国家战略收缩或战略转移,美国的霸权呈现颓势而带来世界的不稳定因素增加。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经过调结构、保稳定、促增长的一些列措施之后仍在合理区间运行,在世界经济中独占鳌头。2013年,习近平主席本着“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的情怀,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宏伟蓝图。自倡议提出以来引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界人士的关注,尤其是政界、商界、学界的精英集团的关注。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国内外学术界纷纷参与到倡议的讨论中来,目前学术界从政治对话、经济交往、社会变革、文化区域、法律视野、战略关系等不同视角来讨论“一带一路”倡议。

就文化区域合作方面,王云霞、张蕊从法律的角度认为,国际区域合作应从传统公约、平台机制、独立机制三重步骤重构文化遗产国际区域合作之路^[1]。成中英从哲学的角度认为,文明对话、文化合作主要目标通

收稿日期:2019-09-15

基金项目:上海外国语大学导师学术引领计划项目(2017032)

作者简介:洪军,男(回族),河南开封人,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政治研究。

过概念、信仰体系的沟通,避免实质性冲突,通向一个更为融通的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在于消除文明之间已有的实质冲突,或至少获得合理的解决方案。对话不单纯是概念的沟通,还要托身于对话传统中的认知力、包容力和对矛盾的化解能力^[2]。朱刚从非物质文化遗产合作的角度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践在尊重文化多样性、促进文化间对话、建设和平文化和谐的目标上是一致的^[3]。吴胜涛、周阳等从文化心理学和大数据分析技术,利用社交媒体 Twitter 数据分析的角度认为,理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自我表征特点,并建立自我表征与社会信任的预测模型,找到有效的合作交往模式,是关系到国家战略实施的重大问题^[4]。目前,学术界鲜有从国际合作理论视角出发对跨文化展开研究。

基于此,本文尝试从罗伯特·基欧汉国际理论视角入手,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文化国际合作的路径依赖,并就跨文化所面临的问题和障碍提出几点建设性实施对策,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合作提出方案、贡献智慧。

二、罗伯特·基欧汉国际合作理论背景与内涵

20世纪50年代,西欧一体化进程的起步引起了新自由主义学者的关注。基于高水平的贸易、通信、文化和其他跨国家的联系与交易使得西欧成为了大众消费的福利国。卡尔·多伊奇等人认为,国家间相互联系的各种类型活动不仅有助于在不同国家的人们中间创造共同价值观与身份,还能通过战争成本的增加进而使战争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同时也为不同国家间的和平与发展、合作与共赢铺平了道路。20世纪70年代,基欧汉和奈合两人在自由制度主义的基础上提出复合相互依赖的思想,然后发展成为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新型国际关系理论,1977年基欧汉与约瑟夫·奈合著的《权力与相互依赖》得以出版使两人声名大噪^[5]。从此开始与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分庭抗礼,进入到新一轮国际关系理论的论战之中。1984年其代表作《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冲突》的问世代表着新自由制度主义学派的初步确立,堪称基欧汉学术地位的奠基之作^[6]。罗伯特·基欧汉(Robert.O.Keohane)成为美国著名的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大师。

《霸权之后》作为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著作其重点提出两个重要概念,分别为“国际机制”与“合作”。作者从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视角分析了在没有霸权国家存在的情况下,国家间合作如何展开和可持续,当存在共同利益的情况下,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如何组织起来。众所周知,现实主义者认为,国际体系是在无政府的自然状态,纷争的盛行是因为根本利益冲突的缘故^{[7](P4-5)}。国际体系要维持稳定,就须要一个霸权国家存在。二战之后,美国霸权地位不断动摇,风靡一时的“霸权稳定论”陷入危机,再也无法解释世界政治经济中合作的产生与发展。而恰逢此时基欧汉和奈提出了复合相互依赖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阐释了上述问题。

基欧汉和奈合认为,以无政府状态国际关系为大前提;在无霸权国家主导下,主权国家间的国际合作和形成契约的国际机制为小前提;得出虽无霸权国家主导,但具有既定共同利益的条件下,国家会寻求对自身有利的理性选择,并驱使国家行为体必然选择在世界政治经济中合作的制度,也就是说“国际机制”将不受“霸权稳定论”制约的结论。但同时基欧汉并没有完全否认与霸权国家的合作,而是在利益共同体的条件下有限的合作,并遵循契约条件下的国家机制,以复合相互依赖的关系存在。在当今国际社会,国家间的关系就是谋求共同利益状态下的合作与冲突,在共同遵循的国际机制下此消彼长的循环往复,波浪式前进。基欧汉借用克拉斯纳的定义,“国际机制”就是“一系列围绕行为体的预期所汇聚到的一个既定国际关系领域而形成的隐含的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8]。如果合作的目的是在国际机制的契约框架下展开的互惠互利、合作共赢,那么国家间的关系必然处于和谐的状态。如果合作的目的是违背契约精神的不道德行为,那么国家间的关系就会产生猜疑和不信任,较容易引起摩擦、对抗和冲突,从而导致国家间的关系破裂。

从当今的国际形势看,国际机制一直都是每个国家致力于建设的,可现实仍存在种种冲突,因此,笔者认为在现行的国际体系下,建立一个有效的国际机制并不是简单的制度守约,而是一个复杂而多元的对接过程。基于此,本文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跨文化合作适用于基欧汉的国际合作理论的问题加以梳理,并就合作过程中遇到的障碍进行分析。

三、国际合作理论范式适用于“一带一路”跨文化合作分析

基欧汉认为,霸权衰弱之后的“合作”类似于准公共物品中的俱乐部产品来类比国际制度体系的秩序、公

平和规则等为前提的。

在国际政治中存在着“有限理性”,而不存在纯粹的理性,因为人作为一种自觉的存在(self-conscious being),能够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是与生俱来的,而克服这些局限性的欲望也是与生俱来的^{[9](P14)}。人作为理性与感性的统一体,在对立统一中存在,在相互矛盾中存在,互相制约和影响,不会出现纯粹的理性和绝对的感性,而是理性与感性的融合状态,即“有限理性”。有限理性是介于完全理性与非完全理性之间的理性。对于一个主权国家行为体来说,就像一个健全的自由人一样,做出完全理性的选择是极其困难的,他们在收集信息并作出决策的过程的成本是高昂的。正是由于国家行为体的决策过程无法实现零成本、零误差,所以,国际机制的原则、秩序、规范和决策程序才显得更有意义和价值。自觉遵守国际机制的规则,虽然无法做出完全理性,但是能够极大的节约成本,是每个主权国家都愿意接受的方式,国家间的合作也就有了实现的可能。基于基欧汉的国际合作理论解析,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合作来说,我们就较容易理解跨文化合作理念和方式了。习近平主席分别于2013年在哈萨克斯坦和2014年在印度尼西亚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此倡议所涉及沿线69个国家和地区。“一带一路”倡议是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所有国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以合作共赢、和平发展为宗旨,并借助“亚投行”“上合组织”等多边机制平台框架下,打造一条政治上相互尊重、相互信赖,经济上相互促进、共同繁荣,文化上相互借鉴、保护多样性的友好交往之路,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梦想能够成为“一带一路”沿线所有国家共同的梦想。“一带一路”的倡议又与丝绸之路沿线的各个国家的发展纲要相对接,成为当今世界跨区域最广泛、跨文化最多元、涉及人口数量最多的合作共赢经济带。也是霸权衰弱状态下寻求既定的共同利益的国际合作典范,是共同守约国际机制的规则和秩序、界定自身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念、而建立起来双边或多边的国际合作范式。

四、“一带一路”建设中跨文化合作的问题与障碍

为了能够适应和应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的复杂和多样性,首先,我们需要认清和了解即将面临的问题与障碍。其次,我们针对这些困难和问题应当采取积极的准备培养一支精通沿线国家语言文字、宗教文化、法律制度的高级别人才队伍,以人文交流、学术讨论为核心人才建设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展开。

(一)语言交流障碍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多达69个,主要分布在亚、非、欧的广大地区,区域内的人口数量占到了世界总人口的60%以上,经济总量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30%左右。从文化角度上来看,区域内民族众多、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极其丰富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重要人文特征。从语系结构来看,区域内主要包括东亚的汉语语系、南亚次大陆的乌尔都语系、中亚乌拉尔山脉一带的乌拉尔语系、中东欧一带的斯拉夫语系、欧洲腹地的英文—拉丁文语系、西亚北非的波斯语系和阿拉伯语语系。

由于沿线国家的语言文字众多,所以在实际语言交流和文字理解上还存在较大的语言障碍,导致合作双方对国际机制和法理规则等问题理解偏差,从而丧失合作的良机。

(二)宗教文化障碍

从宗教文化的视角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宗教文化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国际化的主要特点。首先是多元化,沿线国家的主要宗教文化有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文化,除此之外还有犹太教、印度教、萨满教等其他宗教文化;其次是复杂化,除了上述这些宗教文化的教义本身相去甚远外,其复杂程度多呈现在各大普世宗教内部教派林立,主张各异、纷争不断。再次是国际化,上述这些宗教文化并不是固定的分布在某一区域或是特定的国家,而是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交错的网状分布。宗教文化障碍是摆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前不可回避,也必须面对的问题。如何应对与抉择,考验着合作双方的智慧。

(三)立场独立障碍

“一带一路”经济带沿线的国家都是主权独立的行为体,而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却是相互交融的。由于主权国家自身拥有其独立性,所以在经济和文化中也存在相应的独立性。因此,在政体稳定的各个经济体和文化圈中,就会出现既交融又独立的状态,而主权国家立场独立性又是沿线国家交融合作,推进利益、责任、

命运共同体的一大障碍。

相互立场独立性体现在多方面。首先,在现行的国际制度框架下,主权独立国家的政治决策权具有独立性,互不干涉内政是国际合作的政治基础;其次,经济选择权具有独立性,选择什么经济体制、以何种方式合作都具有自主性;再次,文化认知权具有独立性,面对不同文化人们的认知经验具有局限性,就会对不同的文化公共物品产生理解偏差,从而导致对文化完整信息链的缺失,成为解读不同文化的障碍;最后,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可能使文化公共物品出现排他性和竞争性,甚至可能产生文化冲突。由此可见,政治决策独立缺乏有效沟通、经济选择权独立缺乏合作意识、文化认识局限缺乏尊重认同是产生跨文化合作的立场障碍。

在这种大背景下,跨文化合作无可避免地会遇到不同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经济模式、风俗习惯、文化价值观等各种因素制约,那么,中国又将如何在不同的政体、经济、人文、地域等复杂环境下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呢?尤其是采用什么方法和实施对策来应对政治互信、经济繁荣、文化交流各领域的良性发展,以便理解相异文化的内涵,逐渐弥合文化鸿沟,消除文化隔阂呢?

五、“一带一路”建设中跨文化合作的实施对策

跨文化合作是人际交往和信息交流的重要形式,也是不同政治体制、经济模式、文化内涵在既定的多边国际机制框架下履约的过程。要想在无政府的状态下获得国际合作的成功,就需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做到以下几个方面,才能使跨文化合作成为全球化进程中主权国家间合作的典范。

一是增强政治互信,加强政策对接,是“一带一路”倡议中跨文化合作得以实现的首要前提。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中,一方面,中国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理念,采取不结盟的方式与沿线国家开展外交关系,并旗帜鲜明地反对霸权主义;在联合国、上合组织、G20等多边国际组织平台上相互支持主权国家应独立完整统一,主张以政治和谈的方式解决矛盾分歧;对其自身选择的政治制度表示充分的尊重;共同参与全球治理支持多边主义在国际关系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反对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的举措;另一方面,彼此借助元首外交和充分利用由政府主导的多边合作论坛(如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等)及时发布中远期战略目标旨在宏观层面上相向而行、意图统一;利用部长级会议落实元首峰会达成的一系列政策谅解备忘录旨在中观层面上客观公正、政策透明;及时发布近期合作纲要寻求社会广大民众支持与参与旨在微观层面上有效对接、契合民意。

二是政治搭台、经贸唱戏,互惠互利、合作共赢有助于消除偏见、打破壁垒、促进融通,借助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公共平台让中国企业和产品成功的“走出去”,实现“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共赢新模式。

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进程中,经贸往来与政治决策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政治决策是经贸往来的基础和方向,经贸往来是政治决策的实践与延伸。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加快,以互补性关系为基础的共享经济模式和以竞争性为基础的分享经济模式逐渐开始发挥作用,沿线国家在经济合作中的优劣势不断清晰。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势头向好,经济结构的互补性日益显著,共享优势禀赋成为大趋势,“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成为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但区域性特点显著。中国与沿线国家存在持续扩大经济合作的空间,从国际区域看,东亚、中亚、西亚、南亚等地区短期内存在与中国扩大合作规模的趋势,且合作内容全面向经济性领域转变,分享经济的作用领域不断增多;为了深化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应当从倡议宣传、设施建设、金融服务,以及提高境内区域参与度、构建跨境产业链等五个方面着力,加大保障力度^[10]。

三是加强“民心相通”工程在文明对话与包容互鉴中所起核心要素的作用,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的友好交往、相互尊重和理解打下坚实的社会和民意基础。

尊重多元文明共存,回避文化交流禁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世界不同文明交汇区域的集合,其中每个民族主权国家和地区不分大小强弱、不分种族肤色、不分宗教信仰,都享有平等对话的权利,不能存在文化优越感。文化交流中相互尊重文明的多元性和文化的多样性,正视自身的文化特色,回避文化交流禁忌,排除造成文化冲突的潜在因素,力求达到“和而不同”的境界。

回归“一带一路”建设跨文化国际合作的本质。“一带一路”倡议是基于国际合作理论上发展出来的“和合”包容主义;是既定国际机制框架下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共赢模式基础上发展起来了新型国

际关系的新模式;是与争夺陆海权益零和博弈无关、超越霸权主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使命的新思维和新思路,并引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奏响合作共赢、共同繁荣发展的华丽乐章。从全球化战略视野出发,认真评估政治决策方案、经贸投资风险、宗教文化禁忌,规避国家、社会、企业、个人之间的不良竞争,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文化合作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上来。

六、结 语

罗伯特·基欧汉认为,当代国际关系体系中霸权国家衰落之后,主权国家间在既定国际机制框架下都遵循道德文化上的约束,国际合作是能够实现的,并强调主权国家独立自主的重要性是国际合作的基础。同时,国际合作的决策意义来源于主权国家自身对既定国际制度的守约,以及对共同设定的国际机制在信息沟通的忠诚,并能从彼此合作中获得利益。因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和霸权衰落之后,合作共赢、互惠互利的行为可以降低决策影响的不确定性,所以,当对主权国家之间自由选择权进行适当限制和承担一定的国际义务的时候,国际合作是可以实现的,也是很有意义的。

基于上述国际合作理论的深度解析,在霸权国家逐渐衰退、新兴国家逐渐崛起的当代国际关系大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不是“马歇尔计划”的再现、也不是推行零和博弈新霸权主义和“文明冲突”的文化征服,而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打造一条政治上相互尊重、相互信赖,经济上相互促进、共同繁荣,文化上相互借鉴、保护多样性的友好交往之路;是沿线国家在跨文化的国际合作中传承各国文化交流成果,积极建设以合作共赢、相互尊重为基础,以不冲突、不对抗的和谐世界观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并共同推进世界文化进步,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11],从而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跨文化合作的可持续性发展。

参考文献:

- [1]王云霞,张蕊.一带一路倡议下文化遗产国际区域合作的法律思考[J].西北大学学报,2018(3).
- [2]成中英.文明对话、文化合作与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哲学反思[J].深圳大学学报,2017(5).
- [3]朱刚.“一带一路”倡议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合作[J].西北民族研究,2017(3).
- [4]吴胜涛,周阳,等.“一带一路”沿线文化与合作交往模式探究:基于社交媒体大数据的心理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刊,2018(3).
- [5]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S.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M].Boston: Little, Brown, 1977.
- [6]门洪华.罗伯特·基欧汉学术思想评述[J].美国研究,2004(4).
- [7][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增订版)[M].苏长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4.
- [8]王燕.国际机制的成本收益分析[D].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 [9][美]肯尼思·华尔兹.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M].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 [10]王娟娟.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合作成效及展望[J].中国流通经济,2019(2).
- [11]祁伟.“一带一路”背景下跨文化交流的策略研究[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6(11).

责任编辑:李有智